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十九編 第十六冊

上博簡楚辭類文獻研究(上)

陳民鎮、鍾之順、萬德良、張彩華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九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16 冊

上博簡楚辭類文獻研究(上)

陳民鎮、鍾之順、葛德良、張彩華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上博簡楚辭類文獻研究（上）／陳民鎮、鍾之順、萬德良、張彩華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序 2+ 目 2+15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九編；第 16 冊）

ISBN 978-986-322-876-9（精裝）

1. 楚辭 2. 研究考訂

011.08

103013721

ISBN-978-986-322-876-9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十九編 第十六冊

ISBN：978-986-322-876-9

上博簡楚辭類文獻研究（上）

作 者 陳民鎮、鍾之順、萬德良、張彩華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9 月

定 價 十九編 18 冊（精裝）新台幣 3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上博簡楚辭類文獻研究(上)

陳民鎮、鍾之順、萬德良、張彩華 著

作者簡介

陳民鎮：男，1988年生，浙江蒼南人，煙臺大學專門史專業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藝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出版專著一部，在《中國史研究》、《史學月刊》、《中國詩歌研究》、《光明日報》等處發表論文多篇。負責本書緒論、上編《集釋》的按語、下編〈上博簡〈蘭賦〉與「幽蘭」意象探論〉、〈略說上博簡〈凡物流形〉的性質〉及統稿。

鍾之順：男，1985年生，陝西西鄉人，煙臺大學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負責上編《集釋》材料的整理及下編〈上博簡（八）楚辭類文獻虛詞研究〉。

萬德良：男，1987年生，山東壽光人，煙臺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碩士，負責下編〈上博簡〈李頌〉與〈橘頌〉比較研究〉。

張彩華：女，1987年生，山東高唐人，煙臺大學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負責下編〈上博簡（八）楚辭類文獻草木意象初探〉。

提 要

上博簡第七冊公佈的〈凡物流形〉及上博簡第八冊公佈的〈李頌〉、〈蘭賦〉、〈有皇將起〉、〈鷓鴣〉四篇被整理者視作楚辭體的文獻，本書認為〈凡物流形〉與楚辭無直接關聯，故重點討論上博簡第八冊的四篇楚辭類文獻。本書分為上、下編。上編為《上博簡楚辭類文獻集釋》，對〈李頌〉、〈蘭賦〉、〈有皇將起〉、〈鷓鴣〉四篇文獻進行了集釋、解析，重新討論了一些疑難詞句，在此基礎上擬定了新的釋文。下編為《專題研究》，討論了上博簡〈蘭賦〉所見「幽蘭」意象的意涵，通過釐清篇中有關「蘭」之芬芳及其生長處所的文字，可以進一步證明先秦文獻中的「蘭」確係蘭草，與今蘭無涉，且「幽蘭」亦指蘭草；全面分析了上博簡（八）楚辭類文獻的虛詞，同時與屈原賦的虛詞進行比較，指出這批文獻地域性明顯，且內容極富個性，具有重要價值；通過對上博簡〈李頌〉與《楚辭·橘頌》進行比較研究，發現二者在結構、句式、修辭、思想等方面都存在相近之處；本書還考察了上博簡（八）楚辭類文獻的草木意象；並對上博簡〈凡物流形〉的性質進行了分析。本書對上博簡楚辭類文獻的研究作了初步總結，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序

這部書稿是在陳民鎮帶動下四位同學課餘時間共同合作研討的成果。近百年來，地不愛寶，出土了眾多民族歷史文化典籍，甚至包括學者企盼已久的《尚書》「相關篇章」。而關於楚辭，只有阜陽漢簡中的寥寥幾字，令楚辭學界頗感遺憾。今上博簡第八冊公佈了四篇楚辭類文獻，分別為〈李頌〉、〈蘭賦〉、〈有皇將起〉、〈鸕鶿〉。整理者曹錦炎先生認為，它們是早於屈原的楚辭類文獻。果其如此，這四篇文獻的價值無疑是極大的，值得我們認真去探索其文本意涵與文學史意義。

遺憾的是，除了研究文字學的學者對有關字詞作了零星的討論，尚很少有人關注這批楚辭類文獻的文獻價值。陳民鎮等同學對這批文獻作了綜合的研究，可以說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

整理者的釋文以及其對文本的理解存在一定的缺陷，不少學者已經在網絡上踴躍發表意見。書稿的上編便是針對這四篇文獻的集釋，全面蒐集整理了學者們對這四篇文獻的討論情況，並提出一系列自己的理解。在討論問題的過程中，作者充分結合今本《楚辭》的線索，不少認識發人所未發，具有啓迪意義。作者在釋文的擬定、疑難字的釋讀等方面的態度還是相當審慎的，無法論定的地方儘量存疑。這一部分內容為學者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下編是在上編基礎上的專題研究，雖然屬於探索性質的論述，但都體現出了一定的學術水準。如陳民鎮通過對〈蘭賦〉的研究，對「幽蘭」的公案作了進一步的探討；對〈凡物流形〉的性質作了分析，指出其並非楚辭類文獻。鍾之順對這四篇文獻的虛詞進行了全面的研究，並與傳世的屈原賦進行

比較，得出了一些可信的認識。張彩華研究了〈李頌〉與〈橘頌〉的草木意象，萬德良將〈李頌〉與〈橘頌〉進行比較研究，均屬於創新之作。

我於上個世紀 80 年代，有幸師從姜亮夫先生與崔富章先生攻讀古典文獻學碩士、博士學位。在老師的引導下，我將重點放在以文化人類學理論為指導，以語言文字訓詁為基礎，以傳世文獻為線索，利用考古資料研習《詩經》、《楚辭》。我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都是以《楚辭》、《詩經》為題目。到了上個世紀 90 年代，我又有幸投師李學勤先生門下，在考古學與文明史、出土文獻與學術史等方面深受李先生的影響。到了本世紀，我也由學生變成了老師。我自然以自己向老師所學的知識與方法，再傳授給我的學生，指導他們多讀師爺輩的論著，希望他們能比我更好地弘揚師爺們的學問，從而為研究傳播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作出貢獻。

正因為這樣的原因，我的四位研究生主動選擇上博簡第八冊楚辭類文獻作為研習對象是很自然的。他們很用心，也很有創見，但畢竟還年輕，學術積累不夠，書稿中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也在所難免，希望大家給予批評幫助。而我作為老師，之所以同意他們將這些還不十分成熟的成果提交學界，一個重要的考慮是想借此鼓勵他們的專業上進性，激發他們的學術潛能。作為老師，這一點可能比單純的傳授專業知識更重要。

江林昌

2014 年春



目次

上 冊

序

緒 論	1
一、「重寫文學史」的可能性	2
二、出土文獻之於先秦兩漢文學史的意義	4
三、上博簡（八）楚辭類文獻的重要價值	8

上編 上博簡楚辭類文獻集釋 13

凡 例 15

一、〈桐頌（李頌）〉集釋	17
（一）題解	17
（二）釋文	21
（三）韻讀	22
（四）集釋	23
二、〈蘭賦〉集釋	103
（一）題解	103
（二）釋文	104
（三）韻讀	106
（四）集釋	106

下 冊

三、〈有皇將起〉集釋	157
（一）題解	157
（二）編聯	160
（三）釋文	169
（四）韻讀	171
（五）集釋	171
四、〈鷓鴣〉集釋	213
（一）題解	213
（二）釋文	216
（三）韻讀	217
（四）集釋	217

下編 專題研究 227

上博簡〈蘭賦〉與「幽蘭」意象探論 ——兼說先秦文獻中的「蘭」	229
-----------------------------------	-----

一、先秦文獻所見「蘭」的爭議	230
二、〈蘭賦〉的內容及「幽蘭」主題	234
三、〈蘭賦〉與「幽蘭」之香及生長之所	236
四、〈蘭賦〉與「幽蘭」意象的隱喻	238
上博簡（八）楚辭類文獻虛詞研究	245
一、介詞	246
二、連詞	249
三、助詞	258
四、語氣詞	261
五、簡短的結論	264
參考文獻	265
上博簡〈李頌〉與〈橘頌〉比較研究	267
一、概說	268
二、用韻之比較	269
三、旨趣之比較	272
四、從〈橘頌〉的年代、真偽說到〈李頌〉	274
上博簡（八）楚辭類文獻草木意象初探 ——以〈李頌〉〈蘭賦〉爲中心	277
一、〈李頌〉與梧桐意象	278
二、〈蘭賦〉與幽蘭意象	280
三、結語	283
略說上博簡〈凡物流形〉的性質	285
一、〈凡物流形〉的宇宙觀	285
二、「發問」的哲學	292
三、〈凡物流形〉所見「一」的觀念	296
附錄 上博簡楚辭類文獻研究論著目錄	303
一、綜合篇	303
二、〈李頌〉篇	304
三、〈蘭賦〉篇	305
四、〈有皇將起〉篇	306
五、〈鷓鴣〉篇	306
後記	309

緒論

1925年暑期，王國維先生發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註1）的演講，開篇言「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註2），並臚列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所發現的五項新材料（註3）。在發表這篇演說後不久，王氏便開始向清華學校的學生講授「古史新證」等課程。其中《古史新證》（註4）講義對中國古史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是王氏提出的「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互相證釋的「二重證據法」，成為今後古史研究的重要範式。1930年，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餘錄序〉中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註5）毫無疑問，王氏敏銳把握了「學術之新潮流」，並得以「預流」（註6）。

〔註1〕 這篇演講稿曾發表於《清華週刊》第350期，收入《靜庵文集續編》。

〔註2〕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王國維遺書》第5冊，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

〔註3〕 分別是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

〔註4〕 最初刊印於1925年8月。在王氏投湖自殺後，《古史新證》曾刊載於《國學月報》2卷8、9、10號合刊《王靜安先生專號》（1927年10月）及《燕大月刊》7卷1、2期合刊（1930年2月）。清華大學出版社則於1994年將包括《古史新證》在內的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期間的講義以《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為題出版。

〔註5〕 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66頁。

〔註6〕 「預流」即「入流」，本佛家語。預流果為小乘四果的第一果，即初果，是最低的果位，意即初入聖人之流。

王氏據甲骨卜辭考證殷先公先王〔註7〕，其功厥偉。尤其是揭破了《楚辭·天問》有關王季、王亥、王恆、上甲微等殷先公的謎團，實掃千古之積疑。王氏的相關研究，實際上也開創了先秦兩漢文學史（包括楚辭學）「新證」〔註8〕研究的先河。從甲骨、簡牘等新材料的發現到現在，已然走過一個多世紀。伴隨著新材料的不斷發現，有關文學史問題得以被重新衡量，取得了許多成就，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進入21世紀以來，更多出土文獻的出現，為我們重新審視先秦兩漢文學史的嬗替演變提供了新的契機。尤其是近來公佈的上博簡（八）楚辭類作品文本，為楚辭學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以下擬結合新近出現的出土文獻（尤其是上博簡楚辭類文獻），探討出土文獻對於古典文學尤其是楚辭學研究的重要意義。

一、「重寫文學史」的可能性

我們知道，在20世紀80年代末曾經有過一次「重寫文學史」的討論。這次討論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產生了一定的理論衝擊，甚至可以說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進展很大程度上端賴於這場討論的深入，得益於當年那批中國文學批評家與思想者的實踐。它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而它的過程及背景的確需要我們重新回顧和審視。討論的緣起是《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重寫文學史」欄目的推出，當時陳思和先生與王曉明先生正是這個欄目的主持人。主持人語：「我們今天提出『重寫文學史』，主要目的，正是在於探討文學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性，也在於通過激情的反思給行進中的當代文學發展以一種強有力的刺激。」主持人所期待的「重寫」，包括兩方面的努力：「一是以切實的材料補充或者糾正前人的疏漏和錯誤，二是從新的理論視角提出對新文學歷史的個人創見。」〔註9〕在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後，人們不再滿

〔註7〕 參見王氏〈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以及《古史新證》的第三章〈殷之先公先王〉的考證。

〔註8〕 《古史新證》實際上確立了「文史新證」的研究範式，是「新證派」的肇端。王氏的《古史新證》雖然提出了「文史新證」的基本原則，但局限於「古史新證」；而王氏之學則是「文史新證」，是為「文史新證」的最早代表。「文史新證」的主要研究時段是先秦兩漢，其主要研究對象是文、史、哲各領域，主要研究方法是「二重證據法」，其中「新」體現在新材料與新方法上，「證」表現為考證新說與驗證舊說。遵循「文史新證」的研究範式的學者及學術，可統稱作「新證派」。

〔註9〕 陳思和、王曉明：〈主持人的話〉，《上海文論》1988年第4期。

足於文學史的「複寫」，而是希望在掙脫政治理念以及機械進化論等觀念束縛的基礎上，真正做到文學史的「重寫」。

類似的反思同樣出現在中國古典學的領域。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李學勤先生提出了「走出疑古時代」與「重寫學術史」的看法。當然，不少學者還是從「口號」本身誤解了李先生的初衷。古典學領域的「重寫學術史」，背景與現當代文學的「重寫」並不完全一致。一個重要的現象是，簡帛佚籍的湧現使疑古思潮乃至舊的學術史敘說方式都面臨挑戰。「重寫」的思潮波及到思想史領域，也激起了不少討論〔註 10〕，杜維明先生便曾斷言郭店簡的材料出現之後「整個中國哲學史、中國學術史都要重寫」〔註 11〕。關於先秦兩漢文學史的「重寫」〔註 12〕，則顯然與中國古典學領域的反思關係更加密切〔註 13〕。從某種層面上說，學術史一直是在被「改寫」甚至於「重寫」。於目前來看，說清華簡等新材料「改寫」了先秦史、學術史等領域的若干認識並不誇張。對於先秦兩漢文學史而言，新的材料也的確帶來了不小的衝擊。

在筆者看來，出土文獻對於先秦兩漢文學史的意義，主要在於如下數端：其一，提供了前所未見的新文本；其二，提供了傳世典籍的異文材料以及版本資料；其三，提供了解決某些學術史難題的新鎖鑰；其四，提供了反映學術史嬗變的新材料。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新文本，由於其未經後人竄改，故能客觀反映先秦兩漢時期的文本原貌（包括語言特徵、用字特點等）。目前我們可以根據新材料提取一些新認識，而如若全面顛覆舊的文學史體系則是為時尚早的。

出土文獻「改寫」或「重寫」先秦兩漢文學史的局限在於，目前所見出土文獻信息量不夠，多未能突破原有體系的窠臼，更為重要的是，真正的新文本並不多，故缺乏真正直接的文學史新材料。過去學者運用出土文獻所進行的文學史新證研究，多是利用有限材料的有限信息進行有限的討論，這是需要我們注意和改進的。

〔註 10〕 梁濤：〈疑古、釋古與重寫思想史——評何炳棣〈有關孫子、老子的三篇考證〉〉，香港《二十一世紀》總 87 輯，2005 年 2 月號；曹峰：〈出土文獻可以改寫思想史嗎？〉，《文史哲》2007 年第 5 期。

〔註 11〕 杜維明：〈郭店楚簡與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中國哲學》第 20 輯「郭店楚簡研究」專輯，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 頁。

〔註 12〕 廖名春：〈出土文獻與先秦文學史的重寫〉，《文藝研究》2000 年第 3 期。

〔註 13〕 可以參看裘錫圭〈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34~344 頁。

二、出土文獻之於先秦兩漢文學史的意義

值得慶幸的是，進入 21 世紀以來，更多出土文獻的出現（包括公佈以及未完全公佈的材料）〔註 14〕，尤其是清華簡、上博簡、北大西漢簡等材料，使人們得以接觸更多有關中國古典文學（主要集中於先秦兩漢階段）的新文本，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註 15〕：

1. 詩

這裏所說的「詩」主要是指與《詩經》有關的文本。出土文獻與《詩經》研究的關係，此前已有不少學者論及〔註 16〕。上博簡首先公佈的〈孔子詩論〉涉及孔子的詩論，但尚不是真正的古詩文本。上博簡第四冊公佈的〈采風曲目〉以及〈逸詩〉提供了先秦詩歌的新材料。至於清華簡第一冊公佈的〈耆夜〉，除了出現與《詩經·唐風·蟋蟀》相類的〈蟋蟀〉，尚有〈樂樂旨酒〉、〈輶乘〉、〈鼂鼂〉、〈明明上帝〉四首詩歌，近於《詩經》中的「雅」，是禮樂詩三位一體的宗周社會的生動展演〔註 17〕。最近公佈的清華簡第三冊有多首古詩，其中〈周公之琴舞〉記錄了「琴舞九統」，凡十組詩歌，其中一篇相當於《詩經·周頌·敬之》，並可窺及先秦詩樂舞傳統的概貌〔註 18〕；〈芮良夫

〔註 14〕 主要是簡帛佚籍，甲骨文與金文雖然也有文學史價值（如饒宗頤等先生討論過卜辭的文學史意義，金文中不少語辭可與《詩經》相參證），敦煌藏經洞等文獻也可以稱得上「出土文獻」，但畢竟簡帛佚籍更為直接，信息量更大，年代更為久遠，也更具文獻價值。出於簡帛佚籍的時段，出土文獻在「改寫」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先秦兩漢文學的領域。由於 21 世紀以來與古典文學直接有關的材料趨多，故以世紀之交為界，可以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顯然，我們所處新階段的研究方興未艾。

〔註 15〕 事實上，先秦的「文學」觀念尚未淨化，與今天西方話語中的「文學」並不一致。《漢書·藝文志》中的「詩賦」一類，自然屬於「文學」，而《詩經》則屬於「六藝」，已然是經學的範疇。本文暫且按照先秦兩漢文學史的一般認識，將先秦文獻區分為各類別。

〔註 16〕 于笈：《金石簡帛詩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版；房瑞麗：〈出土文獻與《詩經》研究〉，《文學前沿》2004 年第 1 期；劉立志：〈二十世紀考古發現與《詩經》研究〉，《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4 年第 2 期；夏傳才：〈《詩經》出土文獻與古籍整理〉，《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1 期；劉冬穎：〈出土文獻與《詩經》研究平議〉，《學術交流》2005 年第 5 期；曹建國：《楚簡與先秦《詩》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0 年版；黃寶娟：〈簡牘文獻的詩學研究〉，濟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 5 月。

〔註 17〕 陳民鎮：〈孟子「詩亡然後《春秋》作」解詁——兼論中國早期史學的轉捩與清華簡〈繫年〉（上）〉，《臺灣《孔孟月刊》第 50 卷第 11、12 期，2012 年 8 月。

〔註 18〕 江林昌師：〈清華簡與先秦詩樂舞傳統〉，《文藝研究》2013 年第 8 期。

恣》可與《詩經·大雅·桑柔》等相參證，其篇幅之長、「寓命達聽」的諷諫宗旨、脫離禮樂傳統的自覺性創作均值得我們重視，結合此前有關芮良夫作詩的記載，我們有理由相信芮良夫作為西周社會轉型及「變雅」發生的關鍵人物、屈原之前的一位形象鮮明的詩人有待我們進一步發掘。這些新材料展現了《詩經》之外的某些完整逸詩，對我們重新認識先秦詩之傳佈、詩之地位、詩之創作、詩之彙編等問題提供了新線索。如〈蟋蟀〉一詩，過去認為是「刺晉僖公也」（《詩小序》），據清華簡〈耆夜〉，則是周公所作〔註19〕，可與周公「無逸」的思想相參驗。此前，阜陽漢簡發現了《詩經》殘簡，著名的石鼓文也記載了與《詩經》相類的詩篇，敦煌漢簡〈風雨詩〉則屬於漢詩。

2. 辭賦

首先看楚辭。上博簡第七冊的〈凡物流形〉以及上博簡第八冊所公佈的〈李頌〉、〈蘭賦〉、〈有皇將起〉、〈鷓鴣〉被學者視作楚辭類作品〔註20〕。這些文本為我們審視前屈原時期的楚辭作品提供了新文本，也為有關文學史問題提供了新認識。此外，清華簡第三冊的〈赤鵠之集湯之屋〉為〈天問〉「緣鵠飾玉」的理解提供了新線索〔註21〕。近來入藏北京大學的西漢簡〈反淫〉一篇則出現了「屈原、唐勒、宋玉、景差」等辭賦家的名號。此前發現的楚國卜祀簡、阜陽漢簡〈離騷〉與〈涉江〉殘簡以及銀雀山漢簡所見唐勒賦殘簡等，均是重要發現。

此外，尹灣漢簡〈神鳥賦〉是漢代俗賦的珍貴材料；北大西漢簡〈反淫〉屬於「七體文」〔註22〕，並有部分內容與枚乘〈七發〉近同，是「七體文」的新材料〔註23〕；馬王堆帛書〈相馬經〉文體亦類似於賦〔註24〕。

3. 敘事散文

所謂「敘事散文」，是先秦兩漢文學史的一個概念。在上博簡中，出現

〔註19〕 相關討論參見拙作〈〈蟋蟀〉之「志」及其詩學闡釋——兼論清華簡〈耆夜〉周公作〈蟋蟀〉本事〉，《中國詩歌研究》第9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註20〕 曹錦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書《楚辭》〉，《文物》2010年第2期。

〔註21〕 李學勤：〈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

〔註22〕 傅剛、邵永海：〈北大藏漢簡〈反淫〉簡說〉，《文物》2011年第6期。

〔註23〕 曹植〈七啓八首〉序云：「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

〔註24〕 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364頁。

有〈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雎〉、〈東大王泊旱〉、〈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鄭子家喪〉、〈王居〉等「楚王故事」文獻，也有學者將其中一些文獻視作「國語」類文獻。清華簡第二冊是一篇完整的史書，整理者擬題作〈繫年〉，各章所敘基本以事件為中心，記述列國的源起及發展，綜括歷史大勢及諸侯代興，在事件敘述上也並非流水賬式的記錄，而是匠心獨運的謀篇〔註 25〕，是史傳文學的傑出代表。清華簡第一冊與第三冊公佈了多篇「書」類文獻，為「書」類文獻的形成、流播乃至今古文之爭都提供了前所未見的珍貴材料。一般認為，「書」類文獻主要是記言的〔註 26〕。新近公佈的〈說命上〉以敘事為主，而〈尹至〉、〈尹誥〉、〈金縢〉、〈程寤〉、〈保訓〉等篇章實際上是在敘事中貫穿大量對話，而以對話內容為主體。此前發現的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等，以及最近的北大西漢簡〈趙正書〉等，亦當劃入「敘事散文」一類。

4. 說理散文

文學史學者一般將諸子的一些議論體文獻稱作「說理散文」，此類文獻在簡帛佚籍中所佔比重較大。目前《老子》有郭店簡、馬王堆帛書、北大西漢簡等版本，阜陽漢簡、張家山漢簡發現有《莊子》的相關內容，馬王堆帛書發現有「黃帝書」，以上屬於廣義的「道家」系統；《論語》有定州漢簡、平壤貞柏洞簡等版本，郭店簡發現數篇「思孟學派」的著述，以上屬於儒家一系；長臺關楚簡見及可能與墨家有關的文字，等等。當然，不少文獻學派歸屬未有定論。值得注意的是，廣義的道家文獻往往是韻文，《老子》、〈凡物流形〉、楚帛書及黃帝書尤為明顯，郭店簡〈太一生水〉、上博簡〈恆先〉也有體現，儼然中國古代的哲學詩，道家一脈的學說可以說是「詩性的哲學」。

5. 其他

出土文獻與先秦兩漢文學的聯繫尚不止於此，以下略舉數端：

子彈庫楚帛書提供了完整的創世神話，較《山海經》、《淮南子》等文獻中與神話相關的吉光片羽更具價值，一般的文學通史在講述神話時未能措

〔註 25〕 陳民鎮：〈〈繫年〉「故志」說——〈繫年〉性質及撰作背景芻議〉，《邯鄲學院學報》2012 年第 2 期；〈清華簡〈繫年〉研究〉，煙臺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6 月。

〔註 26〕 《漢書·藝文志》云：「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意，是令人遺憾的；

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提供了「成相體」的新材料；

北大西漢簡〈妄稽〉被視作「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篇幅最長的『古小說』」〔註 27〕；

北大秦簡、放馬灘秦簡等均有「志怪故事」的內容；

敦煌漢簡所見韓朋故事，可與後世的〈韓朋賦〉相聯繫；

九店楚簡〈日書〉、清華簡第三冊〈祝辭〉、包山楚簡、新蔡楚簡、秦家嘴楚簡等，均提供了祝辭的有關材料。

隨著 21 世紀以來愈來愈多完整的、真實的先秦兩漢文學文本的發現，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迎來了新的機遇〔註 28〕。然而，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隊伍往往對新材料措意無多，與思想史、歷史學、古文字學等領域的學者相比，文學史學者對出土文獻的敏感度相對較差。譬如本文重點討論的上博簡（八）楚辭類文獻，文學史領域的學者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究其原因，有學者指出：「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在出土文獻研究方面的落後狀況主要是由於研究者的意識使然。而研究者意識的落後不但由於研究者相關知識的缺乏和視野的狹窄，更受到本學科研究方法和理論的局限。」〔註 29〕可喜的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者對出土文獻愈來愈重視〔註 30〕，其中對《詩經》以及《楚辭》的關注尤爲顯目。1999 年 12 月，「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廣播學院召開。2008 年 12 月，在漳州師範學院舉辦了「第二屆全國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史學術研討會」。在 2012 年 10 月，「第三屆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暨山東省古典文學學會 2012 年年會」在濟南大學召開，這次會議討論的範圍較以前更爲廣泛，從甲骨卜辭到新出清華簡的材料，都成爲討論的對象。「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史研究」、「出土上古文學文獻整理

〔註 27〕 何晉：〈北大漢簡〈妄稽〉簡述〉，《文物》2011 年第 6 期。

〔註 28〕 20 世紀的有關研究參見趙敏俐先生〈20 世紀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一文，載姚小鷗主編《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 2000 年版；《文學前沿》第 2 輯，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0 年版。

〔註 29〕 姚小鷗、李穎：〈「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的前前後後〉，《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史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 頁。

〔註 30〕 此前廖群先生《先秦兩漢文學考古研究》（學習出版社 2007 年版）、陳斯鵬先生《簡帛文獻與文學考論》（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7 年版）、王澤強先生《簡帛文獻與先秦兩漢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0 年版）等屬於這方面的嘗試。

與研究」等課題也得到實施。一些期刊對此也予以關注，《文藝研究》多次發表有關專題的文章（包括 2013 年第 8 期一組關於清華簡「詩」的論文），《中州學刊》2000 年第 3 期、2010 年第 1 期還分別組織了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筆談。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等篇章的出現，也促成了多次學術會議，湧現出了不少論著。但總體而言，文學史領域的學者對出土文獻把握的深度不足，研究方法也比較單一。在面對新的材料如上博簡（八）楚辭類文獻時，關注度並不夠——以上都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三、上博簡（八）楚辭類文獻的重要價值

自饒宗頤先生首倡「楚辭學」以來〔註 31〕，楚辭學的研究漸入佳境，老一輩學者很早便開始注意結合出土文獻來深化對楚辭的認識。楚辭學與出土文獻相結合的優良傳統，延續至今〔註 32〕。此前的相關研究，已有學者作過總結〔註 33〕。除了文本校勘，楚辭所見古史傳說〔註 34〕、〈天問〉所見宇宙生成論〔註 35〕等問題均賴考古發現得到進一步澄清。新世紀以來，隨著出土文獻的增多以及研究的深入，出土文獻對楚辭學的意義愈加凸顯。清華簡第一冊中公佈的〈楚居〉，涉及楚辭學背景的重要史料〔註 36〕，黃靈庚等先生作過強調〔註 37〕。新出清華簡第三冊中有〈赤鵠之集湯之屋〉一篇，為〈天問〉「緣鵠飾玉」的理解提供了新線索。一些學者結合古文字的材料，對「兮」、

〔註 31〕 1978 年，饒公在香港中文大學作了題為〈楚辭學及其相關問題〉的演講，這也是饒公的退休演講，倡議設立「楚辭學」。

〔註 32〕 不少學者注重結合簡帛文獻考證楚辭，最近比較重要的成果有周建忠先生〈屈原考古新證〉（上海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 年 4 月）、徐廣才先生〈考古發現與《楚辭》校讀〉（線裝書局 2009 年版）、黃靈庚先生《楚辭與簡帛文獻》（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代生師兄〈考古發現與楚辭研究——以古史、神話及傳說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年 5 月）等。

〔註 33〕 陳桐生：〈二十世紀考古文獻與楚辭研究〉，《文獻》1998 年第 1 期；周建忠：〈出土文獻·傳統文獻·學術史——論楚辭研究與楚文化研究的關係與出路〉，《文學評論》2006 年第 5 期；周建忠：〈出土文獻與楚辭研究的價值與走向〉，《中州學刊》2010 年第 1 期。

〔註 34〕 江林昌師：〈楚辭與上古歷史文化研究〉，《浙江社會科學》1995 年第 2 期。

〔註 35〕 江林昌師：〈〈天問〉宇宙神話的考古驗證和文化闡釋〉，《文學遺產》1996 年第 5 期。

〔註 36〕 鍾之順：〈由清華簡〈楚居〉再論楚文化與商文化的關係——兼及對楚人始居地的思考〉，《邯鄲學院學報》2012 年第 2 期。

〔註 37〕 黃靈庚：《楚辭與簡帛文獻》，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